

# 新瓶装旧酒的教育改革

文/罗小茗

目前的会考只是因为它不是选拔性的考试而不被人们怨恨，一旦按设想的方案改革，它自然也就带上了选拔性，疯狂的竞争和“应试”的病毒也就从高考转移到了它身上。

近年来，“减负”日渐取代教育质量，成为社会舆论讨论教育问题的焦点和最大诉求。这倒不是因为人们不再关心教育质量，而是抱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只有减负，才能避免学校盛行的应试教育，也才能为真正有质量的教育腾出时间和空间。似乎是要与此种宗旨相配合，“减负”也被明确为各类教改政策的目标。不过，教育部的减负措施，显然不只是舆论压力的产物。在这里，更重要的推动力在于，随着信息化经济的到来，国家对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的要求也随之变化。应试教育下的产出不再符合信息经济的期待。新一轮全球经济对劳动力提出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成为“素质”的新标准。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铲除原有的应试恶习，让学校教育彻底洗心革面。上海的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正是在这一脉络中出台的。据报道，这一正在酝酿的考试改革，大体的方案是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取代自主招生考试，并最终取代上海高考。相关报道最后写道：“这意味着，未来高中学业水平考的重要性将更为凸现，且一考多能，减轻学生应试应考负担。”

## 会考替代高考，换汤不换药

美国高考一再成为这一类改革的有效证据。人们总是乐于以美国为例，认为那里的学生无需题海战术，只要参加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或ACT（American College Test Program），所获得的成绩就可以成为申请全美大学面试的依据。这样做 的结果是避免了机械训练，使得学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反而可能培养出更多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此而言，上海的考试改革，不过是依样画了个葫芦，和世界接轨而已。

不过，对实际承受这一改革后果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多能”和“减负”，却并非报道所说的那样理所当然，此种以“减负”取代“教育质量”的逻辑也未必能够成立。

每一项考试之所以存在，总是源于它所承担的某一项独立的社会功能。改革一项考试的理由从来不可能是“减负”，而是其承担的社会功能是否还为社会所需要？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履行？

这次要被改革的“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其实是每个高中生都要通过的会考，目的在于检验其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只要考试合格，就能获得高中毕业的证书，应考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高考则完全不同，是争夺大学录取名额的竞争性考试。在中国大学经历了“985”、“211”的分等、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均衡的状况下，要想在这一竞争中获胜，获取进入就业市场时较好的位置，自然少不得白热化的竞争。这既是高考为人所诟病的原因，也是教育部出台减负政策基本无效的原因，更是当前在各种压力之下学业重负从高中蔓延到学前教育的主要动力。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障的是整个12年基础教育的水准，从而为国民教育“保底”，而高考则是选拔性考试。对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两项考试所承担功能并不相同，而现有的社会结构却的确产生了促其合并的强大动力。在城市，这一动力表现为参加这两项考试的人群高度重合，在被视为“全民战争”的高考面前，会考自动隐形。而在农村，对那些打算一毕业就去城市打工的年轻人来说，一纸高中毕业证书毫无意义，既没有证



▲ 小学教育看起来在课堂上减了负，可新的负担往往又从别处冒了出来。图/CFP

明其能力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是其通往未来生活的入场券。可以说，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人们自发地合并这两种考试的目的和方式全然不同。在城市，除了一部分有能力让孩子游学海外的家庭之外，绝大多数人仍然要参与这一激烈的选拔性考试。基础教育的“保底”，被包含在这一选拔中顺带解决。而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参与升学竞争，基础教育水准的问题，也一并被放弃或不受重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导致的结果倒是出奇一致。那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考试，在实际生活中的区分已经名存实亡。

不过，这一实际的合并，却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推行“一考多能”的合理性。对教育部门而言，它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此种由社会力量所

造成的现实结果，是否合理？如果合理，方能接受，如果不合理，则必须加以调节。从上述分析来看，这一化繁为简的合并，的确减少了城市学生参加的考试的数量，但对农村学生并无触动。而就他们对考试的基本态度而言，并没有任何改变，要么激烈竞争、以升学方式参与城市竞争，要么彻底放弃，仍是这两个不同群体的基本状态。就此而言，当前的考试改革并未改变任何既有的现实状况。

这一新瓶旧酒的改革，既不带有任何改造现实的愿望，其结果便是新的考试制度势必被既有的现实力量重新定义。说到底，人们对考试的需求，是由现有的社会结构所催生的生存需求的一种类型。只要社会的整体结构保持不变，那么人们在这一结构中产生的需求和动力也就很难发生什

么变化。在此种状况下，考试不过是结构性的产物，它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发生，最终呈现的都只是这一社会结构中实际的争夺状况。此时，学校教育，尤其是升学教育，实际上是国家提供不同的社会流动方式，以修正或微调既有的不平衡的社会结构的手段。教育部门的考试改革，如果只是被动地顺应现实，而不有意识地运用这一手段调整社会流动方式，应试教育的顽疾和由此带来的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解决，而只会成为下一轮改革的由头。

目前的会考只是因为它是选拔性的考试而不被人们怨恨，一旦按设想的方案改革，它自然也就带上了选拔性，疯狂竞争和“应试”的病毒也就从高考转移到了它身上。如此一来，只要人们继续以升学的方式参与

城市社会的竞争,那么学业和考试的负担就一定是沉重的。考试改革也就不可能减轻学生或家长们的负担。改革后的会考,只会接过高考的大棒,继续指挥着人们前赴后继,奋勇前进。

### 减负减了什么,没减什么?

考试改革带来的“减轻负担”又究竟指向何方呢?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高考泄题,让教育部门成为众矢之的。高考是全民战争,自然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而目前这种集中命题和保密的方式,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吃力不讨好。近日,浙江省已经开始向社会各界人士公开征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的试题,以便建立考试命题的试题库。建立试题库,将学业能力测试标准化,通过电脑而非人脑来完成命题,恐怕也是今后考试改革的一大趋势。在试题的人为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保密工作越来越困难,高考命题成为烫手山芋的情况下,这种标准化、技术化的做法的确是转移社会压力的有效方式。但对学业水平和学习能力实施标准化的过程,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研究,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实际工作。目前,这一类研究在中国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在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颁布的课程标准对不同阶段的学业能力都尚无能力清晰表述和界定的情况下,依赖于尚不存在的标准来解决考试问题,不过是把现实矛盾隐藏到了“技术”的名义下。而教育部门理应对此承担的责任,则被转移到了电脑、试题库以及

充实试题库的社会的身上。

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减负”商品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看起来在这里减了负,可新的负担往往又在别处冒了出来。能够“减负”的考试也是一样。在学校里,孩子们的学习越是轻松,那么在学校外,家长需要为孩子学业竞争而准备的额外投资和精力也就越是高昂。在这一过程中,最终被减负或免责的,只是学校或教育管理部门。它们不再给学生布置太多的作业,也再没有填鸭式教育,而只有快乐教学和自主学习。而这些因“快乐”和“自由”而被免去的负担和责任,则最终落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头上。就此而言,不管是今年8月教育部出台的“减负十条”,还是上海的改革高考以便“减负”,又或者是教育部前发言人提出的取消英语课程的建议,这些政策或说法一经出现,便成为人们饭桌上讨伐的对象,正是因为人们明白这一此消彼长的原理。

这一减免和转嫁的过程,势必使得各类补课班技能班的生意越发火爆,教育培训机构也将日益壮大。如果说托福、GRE这一类英语的标准化考试,为中国带来了“新东方”,那么,当前各学科的减负、标准化考试和大学自主招生的推进,则势必为中国孕育出更多的“学而思”。在这里,竞争性考试——无论是高考、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还是改革后的会考,其与教育机构的关系,始终都只是战场和军火商的关系。在高考决定一切的时代,从军火供应到战场交锋,都属于教育部的管辖范围,学生只能在其中选择武器,操练比试。在此种状况下,虽有对更多武器的需

求,各类辅导班也应运而生,但主导者仍是教育部门,可以比试的科目和内容也受制于高考的指挥棒,终归有限。而在后高考时代,对学生和家长而言,无论是课程改革,还是大张旗鼓的“减负”,都意味着正规军火市场减少了武器供应,但仗却还是一样要打,激烈程度也有增无减。新一轮的供需关系自然催生出各种教育培训机构。既为了对付具有区分作用的会考,也为了能在各大高校的面试中一展所长,此时教育培训兜售的产品也就不再受制于高考科目,变得愈加丰富起来。不难料想,“减负”的口号越是响亮,执行越是彻底,由此催生出来的中小学教育市场也就越是广阔无垠,人们卷入这一市场的程度,也就越发深刻与自觉。

在这一教育市场里战斗着的人们是否有负担?这种负担,比起在课堂上的正规教育来说,是重还是轻?这恐怕是今天中国社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必须要问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在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之前,人们就已经各自做出了选择。家境富裕的孩子可以到美国的教育市场里承受相应的负担和快乐,正是大多数城市家长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为此吃再多的苦,也无怨无悔。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则被规定了在此战斗。在这一群体中,没有哪一个天真的家长会相信“减负”,他们毫不吝啬地将孩子投入到各种教育培训班中增加战斗力。而对大多数农民工或城市底层家庭的孩子来说,越是减负,他们就越是在这场战斗中以加速度进入手无寸铁的时代。§